

编者按 面对技术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变局，人文社会学科需因应时代要求，实现整体大发展和学科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于对基础理论问题及其思想理论史研究的重视，并基于问题意识牵引、跨学科视野以及方法论自觉，有望深化若干基础理论论域，在突破学科内卷以及学科壁垒、积极推进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整体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鉴于此，本刊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纵深”为主题，推出一组笔谈文章，希望反映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态势与气象，并对相关研究的开拓与纵深发展有所启示与助益。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纵深（笔谈）

摘要 邹诗鹏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文本文献以及思想理论史研究的开源及其发掘，二是面向现实实践及其跨学科研究需要的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开源与拓新相统一的传统。面向现实实践问题及其跨学科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理由持续开展开源与资源发掘，不仅深化总的哲学观与存在论革命的研究，而且在三大具体领域，即社会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哲学人类学上，持续发力。张梧提出，相比于“往前做”，即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史渊源，“往后做”，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新世界观的诞生地之后的理论史，将涌现出破解“社会存在之谜”、重构从德国观念论到马克思的理论史、开启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对话、重思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思想历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对话、重估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价值、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横向比较等新议题，由此将打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纵深地带。祁涛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整体科学，而非各学科知识的简单叠加。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以本体论创新回应时代需求。这一创新包含三大方向：一是立足全球化变局，对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进行新阐释，构建契合新时代的历史解释框架；二是顺应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重构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三是辩证把握历史方位的重大变革，洞察时代核心矛盾与发展契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史 社会政治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 哲学人类学 社会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3-0005-17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源与拓新

邹诗鹏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别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基础理论资源、文本文献以及思想理论史的持续挖掘，可谓“开源”，二是面向现实实践问题以及跨学科性的开拓创新研究，可谓“拓新”。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资源及其当代性，开源基本上决定着拓新的质地及其深度，只要在“弹性”范围内，开源越深，拓新就越开阔而有活力。拓新也反过来促进开源，如果没有拓新，开源就有可能走向无意义的“卷”。开源与拓

新两个方向实是内在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形成了开源与拓新同向推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及其当代性研究的持续推进，以及诸多哲学领域中跨学科研究的兴盛，即是见证。今天，面对源于与实践与理论的创新需要，以及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研究之需要，有必要持续发扬这一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深发展。本文探讨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之深化，并把其具体研究领域简化为社会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人类学三大领域，分析各自的开源与拓新，尤其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及其研究意义的发掘。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就有着开源与拓展互动的传统。一方面，开源工作有声有色。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经营的领域。21 世纪以来，学界主张通过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以推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推进以 MEGA2 为中心的文本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理论史的研究也同步推进，形成了论、著与史的内在结合。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一系列的批判（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法哲学批判、实践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批判、历史哲学批判、抽象人本主义批判等），开出了一系列哲学领域（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人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并带动了一系列理论论域（如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法理论、历史理论、人论、价值论、文化理论等）的拓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在努力实现开源与拓新的有机统一，并以此锻造了自身的学术传统。

在目前的学科建制下，哲学是少有的能够突破学科藩篱、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哲学具有一切知识学科的总体性，通向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因此哲学实际具有文理交融的本质要求，也将在当今时代包括文理交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哲学+”有着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双向的。因为所有有着实质性理论内核的理论学科，其重大突破与发展，或是基础理论突破学科边界的结果，或是新的方法论撬动基础理论或关键技术所引起的学科创新，而这些都属于哲学性质的创造与创新。所有知识与技术学科的创新，对哲学都有着内在的需要，有着知识与技术学科+哲学的需要。今天，几乎所有学科都在转向人工智能，这一趋势凸显了技术替代人类的希望与焦虑，但人工智能时代最本质的问题依然是哲学问题，能够回应人工智能的智识方式还是哲学。这既是人工智能+哲学，也是哲学+人工智能，经过人工智能的洗礼，哲学将能够完成其当代升华。

在哲学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理由承担更多的领域拓新与跨学科研究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具有“哲学+”的特质与优势，概因为马克思本人的学术探索方式就是当时的一种“哲学+”方式，即在哲学之上，有机而不失分寸地加上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理论、宗教、地理学等。像马克思那样做学问，就会形成一种跨学科甚至非学科性的学术及其致思方式，也更容易展开与不同知识学科的对话。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更多地强调与现实实践以及与相关学科的跨学科交流与对话时，其对方法论的重视，也有益于推进相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变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延安时期起，即取法恩格斯，形成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自觉，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流对话，影响深远。近些年来，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同仁，在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推进 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感受到“马哲+”的魅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对话实践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广阔的发展空间。

学科拓新，前所未有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源的开源。有不少同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开源工作已经完成。然而，在“马哲+”的意义上，仍然大有可为。马克思哲学的论域仍然有待于扩展。而且，从马克思主义诸论域出发，还有必要进行学科上的拓展，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起，完成诸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等学科建设，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当然，在学科林立且学科藩篱仍然存在的境况下，这种学科性的拓展也面临不少困难，但毕竟国家层面正在推动跨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新文科建设；实际说来，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内在需要。

因为现实实践的不断变化及其理论创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拓新没有止境，开源也不可能终结。但

是，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源工作，似又已陷入某种“内卷”状态：大量选题及其表述的重复，种种“重思”式的话语套路，就某一处文本所得却又无关宏旨的提法或只字片语大做文章，随意性的当代意义或阐释，把当下性的问题意识硬塞给经典作家。一些因应于现代实践需要与多学科体系的开源，往往又片面甚至碎片化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区分众多领域，看似符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分科要求的研究，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当时的学科状况——如此肢解或领域误置式的开源，也可能导致化用失效或无效。至于一些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则还谈不上开源，因有意避开复杂多变而又荆棘丛生的现实实践问题，从而躲进所谓学术“象牙塔”，必然导致无意义的“卷”。

正如迎向复杂多变而又荆棘丛生的现实实践问题，是马克思得以走出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并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为克服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卷”或内卷式的开源，也必须迎向现实实践问题，通过拓新从而激活理论资源，做行之有效的开源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必要从某种习惯了的“卷”迈向“拓”，通过拓新的方式，力避开源工作的内卷化倾向。当今的现实实践问题，虽不如马克思当时那样荆棘丛生，但其复杂多变程度却远超马克思所处时代。拓新，也意味着创造性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当下，有理由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源与拓新的传统。首先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文本文献以及思想理论史的持续开源问题，而且，开源本身就需要进行领域的拓展。限于篇幅，这里只就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研究展开一点分析。哲学革命，既是马克思主义之开源的总问题，也是通向领域拓新的开端性问题。

哲学革命从属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立，新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本质相通。哲学的现代转变过程，特别表现为从德国唯心主义向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决定性转变，转变的关键即存在论革命，其意味着马克思丰富理论论域的开端。开端意味着始发地。其后的拓展，有理由向开端作某种回返，但不能总是逗留于这一开端，而应该实际地切入社会实践，并产生应有的多学科及跨学科效应。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①本身的语境，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在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的具体化，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只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般结合，也不只是方法论的提升，而是向具体实践领域的伸展。具体化，尽管不能完全被把握为经验范畴，但显然有理由指向诸多实践活动领域。

青年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②，向实证科学迈进，“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③。马克思之“消灭哲学”以及终止思辨，仍然值得做文章。“消灭哲学”当然不是指去掉哲学的思想性质与分析批判方法，而是在扬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哲学。“消灭哲学”意味着与超验的和实体性的“存在”诀别，转向实践的和社会历史性的“生存”。所谓哲学革命，绝不是要在存在概念及其话语上反复打转和逗留，而是毅然转向生存实践。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革命的实质就是生存论转向，不是转向存在主义式的个体生存论，也不是转向后期海德格的语言—存在，而就是转向实践性的和社会历史性的生存暨社会存在。把握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关键在于真正领会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并从社会存在切入社会现实。只有通过社会存在来理解生存，并从总体上领会唯物史观，才有可能进入马克思主义所拓展的诸多论域。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研究大多还是逗留于存在，而没有真正切入生存，尤其是没有进一步领会马克思本人念兹在兹的社会存在。只要关于切入社会现实的认识仍然只停留于抽象的或话语的层面，或者换句话说，认为进入实践领域便要弃绝理论旨趣，那就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学界越来越重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领会，也正在影响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当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蒂利希等将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理解为生存论转向，并将之前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26页。

至谢林时，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路向，可能并非如康德到黑格尔那样仅仅只是理性本身的运演，而是包含着生命意志的某种转化，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恐怕也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理性主义的本质贯通。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新理解，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可以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与现代实践哲学开端处的非理性主义之间作一个界分。但是，如果凸显谢林哲学，就会发现某种生存哲学的酵素，本身就已存身于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并非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其与现代生存哲学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区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马克思创造性地转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生存论维度，并结合现代性社会实践，成就了自己的实践生存论。

在思想理论史上深化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研究，仍然有待于展开领域拓展。其一，把握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有理由向德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纵深扩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只是德国唯心主义及其观念论的变革，还是从德国启蒙思想、浪漫派以及民族主义向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革命性转变。要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必须结合马克思对德国近代思想传统的系统批判。马克思对德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作过较系统的批判。青年马克思有关知性改良主义的批判，针对的就是康德与费希特的启蒙观；马克思从大学时期即自觉地批判德国浪漫派以及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作为晚期浪漫派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更是青年马克思自觉批判的对象。在这些批判完成之后，马克思开始着手批判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进而展开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对德国启蒙思想、德国浪漫派及其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前史，不做这些前史，意味着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现在人们倾向于用观念论来称谓唯心主义。观念论这一表述对于回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简单的二元对立是有意义的，但观念论毕竟还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批判的德国唯心主义，一旦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还是译为唯心主义更妥。观念论不过是欧陆唯理论传统的自我指认。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还是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对包括整个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其二，研究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需要与马克思对英法启蒙传统的超越关联在一起。不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迷恋，一旦与英法现实相结合，便会土崩瓦解，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所确定的德国实存世界，恰恰要求被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生活过程”^①所扬弃。在马克思那里，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与批判，乃批判与超越英法启蒙传统的理论结果。因此，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显然不能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还需要把握青年马克思对英法启蒙思想传统的批判与超越。人为地撇开英法启蒙传统，并不利于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

三

当领域分得过繁过细，并与现实实践形成某种疏离时，简化资源所处的领域，更有利于推动资源的开源向纵深发展。就论域及其学科指向而言，笔者倾向于在总体的哲学观及其哲学革命的前提下，把马克思哲学简化为三大领域：社会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人类学。如下先分析其中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的开源与拓展状况。

社会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领域。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与西方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一对应的论域，而且，无论从学理义理还是从政治立场上，马克思均不会认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两个领域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合题，所以总体上更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也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或社会政治思想。

社会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反叛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以来即确立并坚持推进的领域，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并在社会解放的意义上展开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这也是青年马克思的主业领域，标志性成果当然是《共产党宣言》。中后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上用功甚精甚深，但其并未停止社会政治批判，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到《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从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与《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到晚年抱病起草关于法国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党成立的“最高纲领”，以及一大批政论文及书信，均是见证。社会政治哲学保持了基本的激进方向，并持续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演进，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史。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中后期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研究，从而疏离了社会政治哲学，显然是不对的。通过欧洲革命推动欧洲现存资产阶级社会转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中后期的核心关切，也是马克思展开《资本论》研究的动因。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道路的探索，恩格斯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批判，甚至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也都聚焦于马克思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哲学，托派以及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则过于放大马克思中后期社会政治哲学的激进维度。目前学界研究较为集中于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但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政治哲学，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应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从哲学、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或论域展开。在学术理论史的意义上，不能忽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重要性不低於西方马克思主义，既要辨析其错误的政治观，也要弄清其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识。中后期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包含着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因此需要联系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东方民族的独立解放及其自主发展道路，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无疑，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实践，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

第二大领域是政治经济学。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到特别是《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基础。《资本论》第1卷一出版，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确定了《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第二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直至法兰克福学派，因其主题偏向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与社会心理领域，而使得《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传统有所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推出《读〈资本论〉》，推动了《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的主要领域。在此之后，福柯、列斐伏尔、布迪厄、鲍德里亚、高兹、阿甘本、弗斯特、詹姆逊、巴克豪斯、阿瑟等人，从谱系学、空间生产、文化资本、消费社会、生态危机、生命政治、文化政治学、空间地理学、价值分析等多个维度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2008年金融危机，在国际学界激起一波“《资本论》热”，詹姆逊、皮凯蒂，均形成重要著作。中国学界也日益巩固《资本论》研究传统。但是，有别于此前主要存身于经济学学科的《资本论》研究传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资本论》研究，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承担，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学。201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150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了研究热潮，经济学界则相对沉寂。政治经济学成功地进入哲学专业的知识库与热点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要领域之一，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的表现与表达。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可望产生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效应。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社会的全面来临，有关加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方兴未艾，开源和化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源，已成为技术社会批判的学术前提。

与《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跟进的还有相关文本文献学研究。MEGA2第二部门的出齐，发挥了特别大的文献学价值。德国与日本学者在此方面贡献较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进入这一领域，有所贡献。中国学界在展开相关文献学研究的过程中，较早地克服了单纯“马克思学”及其技术化研究范式有可能导致的“卷”。目前，中国学界有关马克思文本文献学的研究，已与基础理论以及思想理论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属于可持续的开源工作，有望形成理论创新成果。

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也是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业领域，成就突出，也总体上跟上了国际学术前沿。但不足之处在于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上尚未跟进。人们注意到，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这一跨学科性质的专业，为“马哲+”提供了学科平台。PPE恰是以学科的方式连接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当然也不限于这两大领域，因为PPE要求打破学科壁垒，而避免被看成是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拼盘，以实现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内涵性贯通。现在看来，除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外，还应当更加重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资源与哲学人类学资源。颇值玩味的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再加上历史学，正是“马哲+”所必然涉及的几大主要学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

领域的开源,显然有益于PPE的专业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人才,可更多地来自PPE专业。当然,虽有必要从“马哲+”的角度把握PPE,但PPE绝不限于“马哲+”。

四

以下稍稍重点分析第三大领域,即哲学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内涵还是文本方面,哲学人类学在马克思的探索中都无法与前两个领域相比,但其重要性不可小觑,笔者把这一领域称为马克思研究的“第三空间”。青年马克思即有着哲学人类学旨趣。大学时期,马克思认同知性启蒙思想,肯定康德与费希特的哲学人类学,并以之为浪漫派批判的理论资源;费尔巴哈最初打动马克思的,也是其哲学人类学,但也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中,马克思发现了直观唯物主义及其问题。《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作了有意的逗留,使哲学人类学从属于无产阶级解放及其社会革命。但是,在《巴黎手稿》中,哲学人类学占有完全不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维度,而且,相比于经济学知识的不够娴熟老到,《巴黎手稿》中哲学人类学的表述却已相当成熟,马克思清晰地将人的本质定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①。《巴黎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在思想史上蕴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初始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将《巴黎手稿》看成置于1843年到1848年激进政治语境中的异质文本,还没有真正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激进社会政治哲学的确是青年马克思的主题,这一主题既有激进思想的土壤,也有着哲学人类学的底质,人类解放或人的解放,毕竟是阶级解放的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提出人类史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②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探索越来越多地向东方世界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拓展。晚年马克思并未停止《资本论》研究,但其也关注并探索人类学与民族理论,留有著名的《人类学笔记》。沙夫、诺曼·莱文、莫里斯·布洛克等则认为晚期马克思思想存在着“人类学转向”,这一说法虽有些“硬”,但还是道出晚年马克思在思想关注面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完成了老友的一些遗愿,也恐怕不能说完成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此后,无论是理论史还是现实世界的历史,都在不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

今天,很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资源进行较为充分的开源。这里作一个大略分析。

一是与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的哲学人类学思想联系起来。所谓“人类学转向”的一大问题,就是忽视了哲学人类学是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包括前文所提及的青年马克思对浪漫派的批判以及《巴黎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1848年欧洲革命将民族主义推向前台,即在既有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三大现代主要社会政治思潮外,增加了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要求在民族主义背景下重构现代社会政治思潮。这也意味着重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史,霍布斯鲍姆已做出了卓越成就,一些中国学者也抱有宏愿。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将会不断显化。哲学人类学,显然不能与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割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人类学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人本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哲学人类学的实证科学基础,哲学人类学同样也规定了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激进限度。引入哲学人类学,将使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更为丰满。

二是领会马克思哲学人类学自觉的东方社会关切。要理解马克思日益增长的哲学人类学旨趣,特别需要与马克思本人的世界历史时代及其视野联系起来,这就是东方社会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凸显。这虽然是由马克思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所决定,但马克思向东方社会的自觉拓展,则与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关联在一起。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殖民批判思想,必须把东方民族作为受剥削受奴役的民族与“世界历史民族”以及“无产阶级民族”内在关联起来,并要求对西方民族作出批判,使之在民族平等的意义上进行去势化处理,这也是今天的诸多后殖民理论依然坚持的观点。《人类学笔记》连带着《历史学笔记》等著述及资料,应结合问题意识和马克思思想的延续性,并与恩格斯的著述关联起来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未完成性,与此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受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影响甚深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519页。

各种传统中有关东方社会的研究，是关联在一起的。由此，马克思研究的“第三空间”显示出巨大的理论效应。当今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其理论之根也来自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实践需要。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古今之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西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作为东方社会现代转变的现成起点，这意味着有理由对东方社会的现代起点做出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历史分析。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所有制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得出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凸显东方社会的复杂性、特殊性及其发展主体性。受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影响，年鉴学派试图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前溯至15世纪。年鉴学派之后，诸如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等为东方社会面向现代世界的转化也提供了难得的研究。中国历史学界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开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近年来李伯重、黄宗智等人有关早期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呼应了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并为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与格局。由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有必要向文明渊源及其内在转化方向拓展，在那里，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显然要与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自觉地融合在一起。

三是与开放的德国古典哲学论域关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既有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拒斥哲学人类学的黑格尔式范式，但近些年国内外学界兴起的康德、谢林、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研究，正在形成以哲学人类学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新态势。这既顺应了从康德传统到新康德主义与现代哲学人类学传统的转化，也在理论上呼应了当代哲学人类学复兴。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转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地说，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兴起，虽然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但因其过于强调自然（作为谢林哲学人类学的延伸），实际上走入死局。正是马克思提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①，实现了哲学人类学与社会理论的统一，从而将现代性引入哲学人类学，也将哲学人类学带入现代世界。

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资源与当代哲学人类学关联起来的方向甚多，将得到持续拓展，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作者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领会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拓展

张 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涌现出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批判等新热点，开辟出市民社会、世界历史、社会发展、交往理论、跨越问题、人的解放等新论域，形成了文本文献研究、对话比较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理论史研究等新路径，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新体系，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理论图景。相比之下，青年学人近年来的研究则陷入“高水平重复”的困境，一方面是学院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水准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却是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不断收窄，依旧驻留在前辈学人开拓的学术疆域，重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